



从一条大江到另一条大江(上)

——三峡移民株洲生活记

文/陈自强 汪冰

■壹“离毛主席老家真近”

三峡工程成败关键在移民。
——首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李鹏

这是一个关于两条大江的故事:20年前,他们在欢送声或拆迁声中,拜别故土,从江声浩荡的长江来到旖旎秀美的湘江。

这是一个关于年代的故事:从2001年到2021年,整整20年,他们舍“小家”保“大家”,在原本几乎一辈子都不可能梦到的异地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。

1992年,激乱了半个世纪的三峡工程,以三分之二的支持票一锤定音。渐次竖立的“170M”水位线标志,吹响了百万三峡人背井离乡的号角。现在回头看,三峡已成为继万里长城、京杭大运河之后的又一个国之重器,而百万移民也渐渐成了历史山海中一抹小水潭,倒影里的人挑着大包小包,拜别祖坟,他们的故园从此是水下之梦,是一步一回头的余光。

这批人、这件事在历史的车轮下被提及得越来越少,自2003年的“感动中国”年度人物特别颁给三峡外迁群众,2006年贾樟柯导演拍摄《三峡好人》,美国作家何伟笔下的《江城》之后,三峡移民似乎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虽然伟大,奉献早已成为移民自带的光环,但光环之下,他们每天仍要在晨昏间奔忙,为生计发愁。他们大多经历坎坷,在希望与冷眼、善良与无助中自助并接受他助。一载一载,他们忍受着思乡之苦,在政策和竞争的不确定性中摇摆妥协,栉风沐雨。

株洲与这批移民结缘,已有整整20载了。20年的时光,他们生命中哪些东西被改变了,哪些东西又没有。我们把聚光灯再次对准他们,并非只是因为他们伟大,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个有着七情六欲,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。

新华社报道说,“在一百多万人的数字中,站立着的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,一个个立场各异、利益不同、素质参差、认识有别的公民。”

“就地来看,万州和株洲是两个世界”。春耕时节,崔太和每天都得担着两大桶粪水,给不远处的菜地施肥。七十二岁的他佝偻得厉害,老两口主要经济来源是每人每月50元的移民补偿款和微薄的种地收入。不想给唯一的女儿增添负担,他肩上的锄头还不能放下。

“以往一块田一年至少要种两季,现在一年种一季,我把老骨头感觉受不了。”崔太和深吸了一口烟,双眼紧盯着地面。

崔太和老伴是2004年的一批移民中年龄最大的,也是辈分最高的。

2003年,在村里对迁入地进行抽签时,他那一组抽到了株洲。仅读过两年书的崔太和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,在大队部会议室的地图上沿着长江找湘江,终于在湘潭边找到了株洲。

“离毛主席老家韶山真近。”他说。

得到了大队书记的通知,自己被划为了“单户”,即田地不会被淹,但地势相对较低的住房会被完全淹没,而这间住房,才入住不到五年。

老人很痛心,也不愿意搬走,看着满山自己栽种的果树,崔太和做出了一个决定:既然地势低会被淹,那我就在高出重修房子。

说干就干,他当天就去镇上找了师傅,花了五千多元钱打好了地基,刚准备去购买砖头和水泥,听到风声的大队书记就已经来到了跟前,用命令般语气告诉他:不能修,必须搬。

“胳膊拧不过大腿,他是官嘛。”拿着政府的补偿款,崔太和走了。

在一级又一级的命令下达过后,到了基层,搬迁已成了必须完成的行政命令,搬了多少也是当年考核官员的最大硬指标。“当官的没完成搬迁任务,就立马下台,变成和我们一样的农民。”崔太和说。

2004年3月份,由县、镇、村一把手牵头,带着崔太和等待迁群众前往株洲进行实地考察。考察时,崔太和发自内心的觉得株洲条件不错,“地很平,安置点在马路边上,赶场(上街)又近。”老人就这样一直说服自己,回去又努力说服老伴。

直到搬迁前几天,老人心里一度觉得,自己接受了搬去株洲的事实。

“安土重迁,黎民之性。”最后一天,崔太和召集几个兄弟姐妹一起吃饭,平时不怎么喝酒的他那天喝了半斤多白酒,饭后拿着钱纸、蜡烛带着女儿和大外孙女去了祖坟,少不更事,年仅四五岁的大外孙女哪知老人的离愁别恨,只顾在坟前打闹,惹得平常和蔼的外祖父勃然大怒。

“七月份很热,穿着短袖被坟间的杂草刮了几条很长的伤痕,又痒又疼,但怕惹得外公更难受生气,我一个字也没提。”现在已经亭亭玉立的大外孙女笑着说为数不多的童年记忆。

临行前,崔太和看到政府规定的每家每户所能携带行李的最高标准,又被难住了。

干过几十年木匠的崔太和早就养成

了没什么东西不能用的观念,几乎想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带到株洲的新家,尤其是才不久的木柜、米仓、磨粉机……但最后真正带上的屈指可数,大部分都送给了兄弟姐妹。

崔太和就抱着一块“走出三峡天地宽”的牌匾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,入住花了3万元购买的新房后,立马把牌匾放在了客厅里最显眼的位置。

刚来第三天,老人便萌发了“逃”回去的想法。当地人的株洲话他听不懂,他的四川话当地人听不懂,加上地形不熟、没有亲友,他没有丝毫归属感……

老人全程笑着讲述,笔者以为他已经习惯了他乡,直到他一口一个“我们四川”,我才知道什么是故乡,什么是他乡。

从幼时起,离家几步路的长江就是崔太和最好的朋友。钓鱼、洗衣、游泳,江水拍打两岸石壁的清幽声音,时不时从江上飘来的捕鱼老者的山歌,来往轮船的汽笛声,都给了他最好的安全感——长江在,家就在。

安置点所在的向阳村离湘江不近,但他每周都开着自己的助力车去江边转转。老人说,水流声能给他带来一种心安。

与崔太和是本家的崔太国的家就在隔壁。初春时节,崔太国门,从重庆老家带来的李子树开得很正,其中最大的一棵树已有一人合抱之粗。

崔太国家中共有七口人,儿女都在株洲上班,儿子娶了一个株洲媳妇,女儿找了一个株洲女婿。

一年前到来的小孙女成了夫妻俩的开心果,也成了崔太国心里自己这一家人在株洲落根的标志。“等娃娃长大,我们这一家人也就在株洲开枝散叶了,有亲戚了。”边摸着孙女的头发边说,“等我和她奶奶去世了,这里也就是他们唯一的家了。”

夫妻俩在小孙女到来之后便不再外出务工,一边在家带孩子,一边经营刚来时花钱购置的田地。

“当时我们家算单户,只分了土地,住房还在,属于可搬可不搬的,但农民没了土地怎么活嘛!”

崔太国的老伴每年都会做不少万州风味的香肠腊肉,房前屋后还种了不少在他们看来只有老家才有的花椒树、枇杷树、李子树、柑橘树……

疫情之前,尽管每次回家都得花费好几千元,但一家人一年至少会回万州一次,因为母亲兄弟姐妹都还在老家,可眼下已是第二年缺席家乡的团聚了。

崔太国最放心不下的便是万州老家的母亲。

“也想过把老母亲接来,可她一坐车就晕,上吐下泻。我怕啊,怕年纪大了出点什么事……”

清明时节,远远扫墓祭祖的鞭炮声时起时伏。对祖坟远在千里之外的他们来说,无坟可祭,无亲可寻,好像提醒着他们的血脉远在万州,他们终生都只是株洲的异乡人。

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,三峡移民开始搬迁。

挂在崔太和家的牌匾。

崔家保留的三峡移民宣传手册。

移民们栽在株洲的四川脆李树花开正艳。

■贰“湖南和重庆饮食习惯相近,这就是创业的机会”

2001年8月12日,株洲接收第一批三峡移民,共计628人,主要安置在攸县。

2004年7月10日,第二批三峡移民抵株,共计415人,主要安置在株洲县(今醴陵)和醴陵市。

崔太和在老家时干过几十年木匠,迁株以来,随着年龄的增大,他亲手为自己和老伴各打了一具棺材,当作自己与这个职业的告别礼。

与木匠身份的告别伴随着收入的急剧下降,两个老人都十分怀念在万州的日子。崔太和拥有好几座山的果树,光果树带来的收入便能使一家人过上滋润的生活。

现在,老两口到了一个“易病可又生不起病”的年纪。前年,老伴突发的心脏病,花完了两人一辈子的所有积蓄。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牺牲了这么多,却过着这样窘迫的生活。

而崔太国也从2004年时的一个壮劳力渐渐走向了暮年,工地的大门不再为他敞开,农业收入和子女接济便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。近来,一家人都在为宅基地和住房扩建问题发愁,自己也成了株洲市移民局的常客,虽然每次结果都不尽人意,但崔太国没有一点放弃的意思,早已经做好了下个工作日再去咨询的打算。

这个安置点有好几个回迁户放弃或卖掉了安置点的房屋,选择回重庆或万州购房置业生活。

无论从经济条件方面说,还是从归宿感来看,和崔太国、崔太相比,另一位万州移民冯云都要好得多。

每天晚上十一点的湖南工业大学西街,人满为患的烧烤店和小吃店人声鼎沸,喧嚣声混合着孜然味,让这处校园内的小街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小吃街。街头一处店子,就是万州移民冯云的万州烤鱼店。

万州地处三峡库区腹地,是三峡移民数量最多的地区,占到移民总数的1/5。

工大烤鱼店于2014年开张。当时因为手头积蓄不够,冯云靠银行贷款才实现开店做老板的愿望。也正是凭着这股敢闯敢拼的劲儿,冯云才走进了移民致富的前列。几年下来,冯云光在长株潭就开了四家分店。

刚开店时,冯云对株洲的东西南北都不清楚。在店子营业执照没批下来就先开了门,面临有关部门罚款,可当时全部的钱都投到了烤鱼店里,冯云一家负债累累,无力承担罚款。七十多岁的株洲老人陈瑛便多次找政府部门协商,解释冯云的移民身份,又带着冯云去补办,政府也考虑到移民群众的难处,免去了罚款。

冯云正坐在收银台里,一边翘着二郎腿嚼槟榔,一边等着最后一桌顾客吃完后关门回家。

冯云的姐夫是正宗万州烤鱼的开创者,冯云二十来岁就跟姐夫学习烤鱼手艺。搬迁之前,冯云一直都在成都从事餐饮行业,也在春熙路开过店,直到在株洲开店之前,冯云的工作重心也一直在成都。

“这个店开了之后也总算在株洲落了根。”冯云也开始用当地人的眼光看待这座城市,归属感与日俱增。

“湖南和重庆饮食习惯比较相近,并且株洲正宗

重庆美食比较少,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机遇,所以当时就想着把万州烤鱼这种重庆特色美食开到株洲来。”边说着,又换上一颗槟榔。

来株洲之后,当家里有事摆席的时候,能请的人屈指可数,也只有在这时,冯云才感觉到背井离乡的痛楚,“虽说是落户株洲,很长一段时间感觉自己还是一个外地人。”

不管是移民经历还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餐饮业遭受的巨大打击,冯云总能笑着讲出一句讲出来,“人生有啥过不去的坎。”

照冯云自己的看法,这一方面归功于三兄弟都迁来了株洲,“凡事有个伴”,另一方面得益于早年有长期外出务工经历,没有很深的故土难离的情结。虽然还是一口川味乡音,但冯云自信已很好地融入了株洲生活,“我已经是个湖南人了。”

“当年的移民就像是‘嫁女儿’,婆家好坏都要习惯,你说是不是?”冯云反问道,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槟榔。

“嚼一个不?”

我以不会为由婉拒了。

“刚来的时候,我也不会。当地人递给我一个,就学着他们嚼,嚼完就像被拍住了一样,难受得不得了。但很快就习惯了,现在一天就要嚼大半袋。”

“生活嘛,咋子过,还是得自己选。”冯云换了个坐姿。

注:本文及图片均转自湖南工业大学新闻系
视线编辑部“视线TheView”微信公众号